

闻一多研究丛刊

第一集

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闻一多研究丛刊
第一集
武汉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纪念战友闻一多·····	楚图南 (1)
忆一多兄·····	闻家驊 (5)
论闻一多一九二五年以后的政治思想·····	韦 英 (11)
论闻一多爱国诗·····	陆耀东 (27)
死水下面的火山·····	谢 冕 (40)
闻一多先生诗创作的艺术特色·····	臧克家 (60)
闻一多的诗歌艺术追求探索·····	孙玉石 (70)
闻一多的新诗、诗论和民族传统·····	刘 烜 (80)
从诗境到尘境——《红烛》时期与闻一多的宗 教和浪漫思想·····(香港)吴茂生 (97)	
闻一多的诗论和审美意识·····(日本)奥平卓 (116)	
闻一多诗中的色彩美·····	张 劲 (130)
《死水》的绘画美及其美学意义·····	丁亚平 (142)
关于整理闻一多遗诗《真我集》的说明 (附原文)·····	孙党伯 (147)
闻一多和外国诗歌·····	薛诚之 (166)
闻一多先生的学术途径及其基本精神·····	季镇淮 (180)
关于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日本)中島碧 (190)	
闻一多与《山海经》·····	孙昌熙 (192)
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 ——为纪念闻一多先生80诞辰作·····	费振刚 (208)

闻一多先生与唐诗研究.....	郑临川 (227)
律诗：中国式的艺术美	
——读闻一多《律诗底研究》.....	袁蓉正 (243)
闻一多先生未刊稿说略.....	沈祥源 (260)
闻一多研究报刊论文索引.....	王德震 (268)
中国闻一多研究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295)
后记.....	(297)

纪念战友闻一多

楚图南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横眉怒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用鲜血和生命写完了自己历史上最壮烈的一页。闻一多象多数旧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经过苦闷和失望，经过彷徨和探索，终于在斗争的实践中走上了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道路，并为之付出生命，他理所当然地得到人民的崇敬和纪念。

闻一多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封建世家，早年曾醉心于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文艺，大革命时期，又曾信奉过国家主义。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到处是军阀混战，灾荒连年，祖国贫弱，民族苦难。严酷的事实猛烈地敲击着他。唯美主义和国家主义能改善这黑暗世界的一分一毫吗？躲进小楼书斋，埋头于卜辞金文、先秦文献，能逃避现实，找到出路吗？

严酷的斗争事实教育了他，人民的苦难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看到的是公路上衣着褴褛、被长官恶骂、毒打的伤兵，他听到的是夜半野狗在新坟上争食的狂吠，他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经受颠沛流离，经受外患和法西斯独裁的深重灾难。记得是抗日战争末期的一个端午节，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聚会，有人请他题扇，他当众挥毫，写下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里他对屈原的旧作，赋予了新义。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人民大众的苦难和斗争中，找到了归宿。他看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将取代他心中曾经憧憬过的“红烛”。他坚强的意志和奔放的热情，终于使他大胆批判和否定了过去，清醒地看到在熊熊的革命烈火后

面，将有光辉的未来。1944年他曾经公开说过：“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我们骂错了。鲁迅对，我们错了。‘海派’为什么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弄得国家这步田地……。”他还说过：“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几十年了，一个字一个字地‘弄透了’，越弄，就越觉得要不得。现在，我们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在经过了半生的彷徨、探索，一多终于从实践中得到了结论：“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旧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是不断分化和转变的。一多由一个鼓吹“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的诗人、学者，终于在党的启示和号召下，在革命的激流推动下，昂首挺胸走到人民大众的革命行列中，为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多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也是英勇壮烈的。

一多曾多次在青年学生的集会上痛斥依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高等华人”，而且他总是把过去的他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而加以严厉地痛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多追求真理、向往进步的精神，看到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觉醒。

昆明，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后方。北方的许多大学先后疏散到这里，蒋介石也把手伸到这里。由于地方军阀和蒋介石政权的明争暗斗，也由于各式各样的思想和意见的纠纷，当时昆明的形势是复杂的，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对人民革命的解放事业，不能不带来不利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时候，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派人到昆明开展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民主运动、青年和文化界的救亡运动才有了正确的方向，促成了各种抗日救国力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高涨。特别是闻一多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拍案而起，毅然参加了民盟云南支部的工作，担任宣传部长，开始忘我地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开

展工作，起到了别人不能起的巨大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多对革命工作的积极热情，是不会令人忘怀的。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当时，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和破坏，民盟的各种文件都是用个人化名的私章行文的。一天晚上，当民盟云南支部的组织机构确定后，朋友们便把为这些组织化名刻图章的工作委托给一多。第二天一大早，一多就来到了我家，用颤抖的手，递给我四枚由他自己设计、连夜赶刻出来的代表民盟云南支部的“田省三印”，代表秘书处的“刘宓”，代表组织部的“祖范之印”和代表宣传部的“杨亦萱印”的石章。我当时望着一多布满血丝的眼睛，接过了四枚图章，深深地为一多的忘我精神所感动。这件事已过去30多年了，每当我想起时，当时的情景好象还历历在目。

一多的革命激情，来自人民群众，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诱导和培育。一多所走的道路，代表了千万个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在他身上凝结着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凝结着人民群众对他的激励和期望……。这些，汇成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仰，汇成一股金石可穿的力量。

旧政协开会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攻击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一多当即义正辞严加以批驳，一多说：“共产党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有头就有尾，这个尾有什么不好。”他明确地表示了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决心和愿望。正因为这样，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手枪开始瞄准闻一多了。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大街上枪杀了李公朴先生之后，闻一多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向社会各界振臂高呼，愤怒控诉。当年诗人澎湃的热情变成了人民战士义无反顾的革命壮志。正象他在群众大会上所说的那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以他的实践表示了自己的革命决心。他终于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一多壮烈的呼声，仍然响彻云霄，震撼着人们的心弦！一多的精神永垂不朽！

忆 一 多 兄

闻 家 驹

1946年夏天，西南联合大学由昆明复员，迁回平津，我在这年的五月下旬就回到北平了。在我离开昆明前一两天的一个下午，一多兄到我家里来看我，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谈话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平时因为工作忙，除了在公共场合和他见面以外，他很少来看我，而我去看他又往往碰上有人来找他，或者就是他不在家；能够像这一次那样从容不迫地两个人坐下来，大事小事一起聊，在抗战后期昆明那种紧张动乱的岁月里，的确是很难得的。我记得他曾告诉我说，他因为在昆明还有些工作须要处理，不得不把行期往后推迟，同时，他还想顺便回武昌去看看，巴河老家是来不及去了。他又说，抗战虽然胜利了，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回北平后恐怕还不能很快地恢复以前那种教书生活。他又曾嘱咐我，曾昭抡和吴晗要回北平，关于民盟的工作，和他们两位联系就行了……。临走时我送他出来，我们又站在院子里聊了一会儿，好象彼此都还有很多话要说似的，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谈话，因为一个多月以后，即7月15日，他就在昆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当我从北平的报纸上看到一多兄遇难的消息时，我的心都碎了。我恨不得插上两支翅膀立刻飞回昆明去。那时，我刚回北平，由昆明同来的熟人也还不多，我拿着报纸想去找杨振声先生，因为他和我住得比较近，但是走到半路，又折了回来，我心

里想：“找他又有有什么用呢？”真是天昏地暗，举目无亲啊！几天之后，我看到从昆明寄来的他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讲演的油印记录稿，我激动得浑身发抖，一边看，一边淌眼泪，几次被泪水打断，看不下去。今天回想起当时的心情，只有用这几个字来概括它：愤极！痛极！恨极！

我们弟兄五人，一多行四，我行五。我们谪堂弟兄十七人，一多行十一；我们经常叫他十一哥，但更多的时候叫他一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的。

他入清华的学名原来是闻多，以后，加了个“一”，叫“一多”，但一多和一哥这两种称呼中的“一”字，彼此是没有关系的。一多兄比我大六岁，他不但是我的兄长，而且也是我的师长，我一生在读书、学习、工作和政治活动等方面，都曾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点。

早在清华念书时，他就关心我的前途，鼓励我考清华中等科二年级，写信告诉我准备哪些功课，还要求我写读书心得。后来他在美国留学，虽说学习很忙，还是在家信中经常嘱咐我课外要多阅读杂志，打好普通知识的根底，他说“根底既成，思想透彻，然后谈得上做专门的学问。此非文科独然，实科亦莫不然。”又嘱咐我要多写信质疑问难，“虽远隔重洋，书信往来，节序已迁，但研究学问，真理不改，时间不足以囿之也”。但是后来针对我的具体情况，他又叫我停止写札记，不如以此时间多读书，获益更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如今你的缺点乃在于‘思而不学则殆’。读书甚少，仅就管窥蠡测之知识，思来思去，则纵能洋洋大篇，议论批导，恐终千万言不值杯水耳……。例如本次札记中读老子哲学，固见思力，但此种问题，我尚望之却步，况吾弟之初学，岂能必其言之成理乎？此种见解存之脑中可也，笔之于书则不值得。故目下为弟之计，当保存现有之批评精神以多读

史书……。杂志除《创造》外，若《学艺》、《东方杂志》、《民铎》、《改造》亦宜多看，以求得普通知识……。”

今天重温他对我的这些恳切严明的教导，不但使我深受感动，而且觉得他这种务求实学，不尚空谈的治学态度，对今天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有益的。

令人难忘的是暑假两个月的家居生活，他给家里带来的那种自由、活泼、新鲜的气氛。我们家庭虽说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但是读四书五经的传统习惯仍然存在。在经子史集四类书籍中，父亲主张读经，一多兄则主张多读子史集，而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大量阅读这些书籍的。他嫌一般的书桌不够使用，于是便把裁缝做衣服用的案板拿来当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以及稿纸和稿本，重叠沓杂，每隔几天，总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从他青年时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我上中学以前，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念书的，因此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对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也读起《史记》、《汉书》、《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钞》这一类书籍来了。他在某一年暑假给他的朋友的信里曾写道：

“归家以后，埋首故籍，著述热大作，校订增广《律诗的研究》，作《义山诗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笔数记则，暇则课弟、妹、细君及诸侄以诗，将以诗化吾家庭也。”

记得有一次他给我讲解苏子瞻留别其弟子由的一首诗，题为《辛丑年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讲到“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时，他不禁感慨系之。这时，他心里显然是以子瞻自比，而把我比作子由的，因为岁月如流，眼看暑假就要结束了。

我上中学，开始学的是英语，为什么后来又改学法语呢？这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决定的：“我们家里大家都学英语，你就学法语好了。”于是我就改学法语了。至于我学法语而又选定法国文学这门专业，那更是和他本人爱好文学的倾向分不开的。

1925年夏天，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当时我正在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念书，学校当局以举行考试为由，要求所有参加罢课运动的学生，一律返校，否则就要开除学籍。当时，我没有回学校，家里的人多不赞成；因为在那时候，震旦大学是国内唯一的一所用法语教学的高等学校，离开震旦，便有失学的危险，但是我这个行动，却得到了一多兄的支持。

后来我去法国留学，经济方面，一多兄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留学法国开始是自费，后来才补上了湖北省出国留学的公费名额。以当时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而论，要维持我在国外念书的生活费用，毕竟是感到吃力的。这笔费用是由父亲统筹，而由几个哥哥酌情补助的。一多兄当时已经是大学教授，工资收入较多，因而他拿的钱就比较多一些。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破家亡，离乡背井，他到了昆明，接着我也就去昆明了。我第一次看到的关于介绍中国革命情况的书籍，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是一多兄交给我的，而在看完以后，又遵照他的嘱咐传递给另外一个朋友了。在新华书店还没有在昆明设门市部以前，我看到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书刊，多半都是从他那里取来的。他的那些仗义执言，追求真理，爱憎分明，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和讲演，如《可怕的冷静》，《画展》，《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人民的世纪》等等，曾经感动过许多人，也感动过我，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尽管我当时常常感到自己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过：“千百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也在饥饿线上挣扎；不是我们不想研究学问，

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走出书斋啊！”

大约是在1945年左右，我写了一篇介绍戈吉野的文章，发表在昆明文艺周刊上。戈吉野是法国十九世纪唯美派诗人，读一点或介绍一点唯美派的理论和作品，就其本身来说，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土日蹙，民不聊生那种局面下谈唯美派，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问他看到那篇文章没有，他笑着说：“你现在还写这类文章啦！”我回答说：“那是我在这方面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但紧接着我又补充说：“艺术好比是座公园，城市里总该有这么一块清静的地方。”“不对”，他立刻回答说：“在非常时期，公园里也要架大炮呢！”他一语道破文艺问题的实质，使我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不久以后写了《死去再生——向罗曼罗兰学习》的短文。

一多兄一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是很多的，上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的点滴而已。

一多兄是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生活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他从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转到过问政治，从埋首钻研古籍转到毅然走出书斋，从“一个观念论者”变成为投身火热斗争的民主战士。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的心，这颗心差不多贯串在他一生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项行动之中；他也走过一些弯路，例如参加过国家主义派，又和新月派混了一阵，但这也都和他为祖国寻求出路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在不到50年的短短岁月里，他一直在摸索，在寻找。这个“几十年来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真理”，终于在实际生活中，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那就是人民的道路，革命的道路，而在一经找到之后，他便勇敢坚定地走下去，直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党；他虚心学习，勇于否定过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无私无畏，临危不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他和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以及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新诗创作和古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而他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多兄年轻时，每于家人说他糊涂，不喜应酬时，便脱口而出回答道：“吕端大事不糊涂”。回顾他的一生，他是完全做到这一点了。今年是他逝世33周年，也是他的80诞辰，谨赋诗二首，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

书生岂昧兴亡责？
痛斥豺狼拍案起，

事于大处不糊涂。
滇南高义震神州。

二

一人倒下万人起，
目睹山河新景色，

热血从来不自流。
阿兄应亦喜丰收。

1979年4月12日

论闻一多一九二五年以后的政治思想

韦 英

闻一多是著名的诗人、学者，他对我国的新诗创作和古代文学研究，都有杰出的贡献。但是，他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敬仰和怀念的，主要的并不在于他的新诗和学术方面的成就，而是他从一位旧知识分子转变过来走上革命道路，最后并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研究闻一多不仅要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尤其应当好好研究他的政治思想。本文将着重对他1925年以后各时期的政治思想进行一些探索。

一、曲折求索的十七年

闻一多是1925年留美回国的。回国之初，他曾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两年之后，又逐渐钻进古书堆，专心搞教学和学术研究，而把世界交给丑恶去开垦，直到1942年，才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中间经过了17年。这17年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期间，中国大地上先后发生了两次震撼人心的大事。第一件是1924~1927年的大革命，它由于蒋介石的叛变，使千万革命人民倒在血泊之中，革命由高潮转向低潮。第二件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发展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爆发的全面的抗日战争。在这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震荡的重要时期，闻一多的政治态度怎样呢？他所思、所言、所行又是如何呢？

科学地评价一个人物，必须把他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依据他本人的思想和言行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下面，我们将在这个历史画面的背景上，看看闻一多的思想，经过一些什么曲折和变化。

（一）始终如一地热爱自己的祖国。闻一多归国之初，恰逢五卅惨案，他发表了《醒呀》、《七子之歌》、《我是中国人》等大量爱国诗篇，目的是为了“在同胞中激起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不久，他出版了具有浓厚的爱国意识的诗集《死水》；“三·一八”事件发生后，他激动地写出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一八》和《唁词》悼念殉难烈士的文章。以后，他全力以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是为了倡导和发扬中华文化。

抗战初期，他曾等着应征，准备“上前方参加工作，或者在后方从事战时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和民众教育上尽点力。”在湖南南岳和步行赴昆明的途中，他忍受着“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一类的东西”，“在农舍地上铺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的生活，他告诉妻子女女，“这样度着国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

在蒙自他听到败北主义者抗战必败的谬论，深觉是“一件大苦事”，“简直是活受罪！”40年代初期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暴涨，他的“书籍衣物变卖殆尽，生活殊窘”，仍教育子女：“前方将士为了抗战流血牺牲，咱们后方吃点苦算什么！”

这些都说明爱国主义火焰时时在他身上闪光。

闻一多对祖国之爱，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他对祖国是全心全意的无私的爱。为了祖国，他可以象在《国手》一诗中所描述的，“将我的灵和肉，输得干干净净。”唯其如此，他才同那些最终走向反革命的国家主义分子，新月派分子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我国彻底的爱国主义必然通向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后来转向革命其重要的内因之一，就在于此。

第二，他爱祖国的一切。他爱祖国的山川草木，爱祖国的鸟兽屋宇，更爱祖国的人。他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因此，他的诗不仅闪耀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火花，也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

第三，爱国主义支配和制约着他的一切言行，他学美术，写新诗是出于爱国；放弃诗画专攻中国文学，还是出于爱国。他投身于政治斗争，是为了救国，以后政治斗争之路走不通，转而致力于学术研究，仍然不忘发扬中华文化以振兴中华。他的一切重大言行都可以从爱国主义找到解释，甚至他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也是误以为只有如此才能救国。

当然，需要指出，当时他还不懂得对国家要作阶级分析，正象他后来所说：“过去我只晓得抽象的爱国，不知爱什么国”，“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因此，他那时的爱国主义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爱国主义。

（二）曾一度误入歧途，反对共产党。留美后期，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以前，他主张艺术救国，这时他意识到只靠艺术不行了，还必须致力于政治上的改良和革命。1924年6月14日他在一封家信中说：“近者且屡思研究美术，诚足提高一国之文化，为功至大，然此实事之远而久者。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故吾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也。客岁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其性质已近于政治的，今又有人提议正式改组为政党，其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①他误把国家主义当作救国真经，抱着鼓吹主义，改良政治的想法而提前回国了。

他一回国，就投入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他给梁实秋写信，说什么“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呼吁“同志快回来共同奋斗”。

早在清华求学时，闻一多对共产主义就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解和偏见。他曾借一个美国画家的话攻击共产主义说：“假若一个发怒的神灵要用一种特别的酷暴的刑具惩罚人类，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将全世界的绿色都变成赤色更可怕些。”他诬蔑信仰共产主义的进步青年是“可怜的时代牺牲者”，“他们的神经竟被布尔什维克的赤旗螫得发狂了”^②。在留美归来不久，他就主动去找李璜、曾琦等人的醒狮社串联，参加“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把斗争矛头直指共产党。直到1926年春他还与李璜一伙反共分子密切合作，积极策划和主持所谓“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反俄援侨大会”等群众性集会，借以挑起对共产党人的武斗”^③。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写了诗文以示悼念。事先他也知道要开群众大会声讨段祺瑞的卖国罪行，但他却不去参加。据李璜说，这是他告诉闻一多此会是共产党人发动组织的，不要去参加，并说去了“是为共产党跑龙套，如果在乱军中受了伤，送了命，报不了帐”。结果闻就没去。这里，又写诗文悼念烈士，又不参加会议，看起来是相当矛盾的。但这个矛盾恰好反映了他当时既反共又爱国的复杂心理。

1927年春，闻一多曾参加北伐军政治部工作，但是，“受任一月即行告退”，又回到国家主义分子聚居的上海政治大学去了。“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不仅对共产党血腥镇压，连国家主义的上海政治大学也查封接收了。国家主义分子只好作鸟兽散。此后，闻一多再没有象原来那样激烈地反对共产党，但是，他的认识并没有根本转变。1931年“九·一八事件”时，他在青岛大学任教，平津学生结队南下赴京请愿，他同梁实秋等人认为